

16

河南 文史资料

1994

1

(总第49辑)



- 歼灭日军坦克之战
- 郑州黄河铁桥长度争论记
- 百泉乡师和河南新屋文艺社
- 我的大伯父袁克定
- 忆豫北浚滑汤天门会

ISSN 1003-1219



04>



9 771003 121009

河南

HENAN

文史资料

WENSHI ZILIAO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4 1

(总第 49 辑)

河南

HENAN

文史资料

WENSHI ZILIAO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4 1

(总第 49 辑)

EA82/52

河南文史资料

季刊

文 化 天 地	开封《中国时报》述略（下）	阎希同	4
	《前锋报》漫忆	郑克家	29
	我在《行都日报》	张黎至	35
	在《河南民国日报》的最后日子里	郭也生	40
抗 日 烽 火	我在抗日烽火中的经历	李志勤	44
	抗战初期孙殿英部的教导大队	张逢溪	55
	灵宝歼灭日军坦克之战	张永春	59
郑州黄河铁路桥长度争论记		郝育森	63
校 园 忆 往	任百泉乡师指导主任的回顾	李道祥	66
	七七事变前的河南省立百泉乡师	刘志读	99
	百泉乡师和河南新垦文艺社	乔景楼	10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中原人物	我的大伯父袁克定	袁家宾	122
	忆廷宝	陈法青	154
	建筑学家杨廷宝	丁涓涓	174
	父亲李瑞安的后半生		
	李尊民 李尊美 李尊一		187
	终生献给医学事业	朱德明	196
社会百态	忆豫北浚滑汤天门会	杨成宪	202
	枪会御匪记	王景秀	214
	漫话旧商行	王鸿魁	219

质疑·订正·补充

223

补白

镇平县丝绸改良委员会 (34) 南阳道士张宗骞 (58)
 方城废除官轿与酷刑 (153) 于右任赐楹联 (201) 郑州
 银行街 (213)

主编 吕斌 副主编 魏一明 王锡朋 高蓉生

开封《中国时报》述略(下)

阎希同

同南阳《前锋报》出联合版

《中国时报》为了增强报社内部的力量,由郭海长的父辈建议,经中共党组织同意,于1947年元旦起与南阳《前锋报》正式出联合版。联合版开始时仍为对开四版一大张。1月29日起,因铁路交通中断,纸张奇缺,开封各报一律缩小版面,联合版也改为四开两大版,一版为国内外要闻,二版为省市新闻、副刊和广告。

联合版在《发刊词》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两报的立场,就是联合版的立场。我们没有新的立场,仍是以人民立场,作爱国工作。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凡有利于国,为人民所拥护爱戴者我们亦拥护爱戴之;反之,有害于国,为人民所深恶痛绝者,我们亦深恶痛绝之。

扶植正义,不畏强御;提倡学术,增进科学知能;解除人民痛苦,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不以报纸为工具达成私人不正当之目的。只问公是公非,不与任何人修私怨;不立异以鸣高,不盲从而附和。凡此种种,均两报以往所勉力以赴者,今后仍当互勉互学,期少过失。

联合版就是按照发刊词的宗旨进行工作的。

联合版的人员,以《中国时报》的全体人员为基础,《中国时报》与《前锋报》各推举了三人参加领导工作,《中国时报》方面为郭海

长、梁建堂、郭也生，《前锋报》方面为李静之、赵梅深、孙良田，再加新回到开封的刘国明共七人，组成社务委员会。他们的分工是：发行人，《中国时报》为郭海长，《前锋报》为李静之；总编辑为刘国明，副总编辑为孙良田、梁建堂；总主笔为赵梅深；总经理为郭也生，副总经理为崔进平。出联合版后，《前锋报》仍在南阳继续单独出版，李静之留在南阳主持，联合版由郭海长全面负责。

这时期的领导人员，认识一致，关系融洽，较好地发挥了核心作用。新增的领导成员中，孙良田原为《前锋报》总编辑，在抗战期间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曾参加过中共，后与组织失去联系。他做新闻工作多年，业务熟练，外文较好，翻译了不少文章。赵梅深原为《前锋报》主笔，长期做新闻工作，又是知名的作家，是中共领导下的国际新闻社的成员，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报道和文艺作品。孙良田和赵梅深二人友谊深厚，在《前锋报》时，均因政治进步而受到特务的监视和迫害，让他们限期离开南阳。刘国明的情况在前面已经介绍。他们当时都是30多岁，办报经验也比较丰富。处事比较老练，遇到问题及时商量，使报纸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能够不断克服困难前进。

1947年工作人员仍较少。原《中国时报》编辑主任刘世明，为避免当局注意，转移到《民权新闻》去了。编辑工作主要由刘国明负责，新闻编辑有陈承铮、陈铸，以后又来了吴贯之；副刊由赵梅深负责；资料室工作由寿孝鹤、张文英负责；采访主任仍为李松灵；校对工作起初仍是许金台，后来许到解放后的洛阳参加工作，陆续来做校对的有乔元庆（周原）、袁蓬、邓两峰、黄丙寅等。这年夏季，河南大学因学潮而停课，河大校长的秘书田雨三（中共地下党员）介绍中文系学生赵中兰（后改名赵岚）来报社，抄录外国电台的华语新闻广播，以后又选辑资料。

这一年，报社的中共党员又有增加。乔元庆是5月份由中共冀鲁豫区委城工部派来开封的，由赵悔深介绍到联合版以校对工作为掩护。7月份，刘国明也参加了中共。他是在年初经他弟弟刘世明介绍与中共汴郑工委书记刘鸿文相识的。刘鸿文向刘国明提出三项任务：掌握好宣传分寸，不要把报纸办得太突出；了解国民党上层情况；培养新闻干部。刘国明完成得较好，被吸收入党。1947年上半年，陈承铮的一位同学，从豫皖苏军区情报处到开封工作。需要找个职业作掩护，陈承铮介绍他到报社任编辑，并给他一些协助。

由于内战持续，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联合版在经济上仍然十分困难，幸亏中共冀鲁豫区委在1946年底又给报社送来一笔资助款项。1947年夏，又由城工部科长孟起交给报社10个金元宝。9月，国民党六十八军三五六团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张公干在山东鄆城起义。孟起及时通知郭海长，连夜组织人到该团在开封的办事处抢运出一批面粉，这些对缓解联合版的经济困难都起了相当作用。此外，借助郭仲隗、刘积学的关系，又募集了一些资金，郭海长将其中的一部分交韩吉门经营盐业等，补助报社开支。开封驻军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也曾给过报社一些资助。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社的开支必须力求节省。工作人员吃的仍是粗粝的伙食，每月领取很少的零用钱。同人中已成家的都无力养活老小，还得靠家属挣钱养家，但大家并无怨言，仍然干劲不减。

报道再次出现高潮

联合版出版后，宣传报道又出现一个高潮，突出的是信息量增多。在筹备联合版时期，报社就从南京、上海等地陆续约请了一批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或设本报特派员，报道国内政治、军事、经

济方面的重要新闻。1947 年上半年,联合版经常采用“本报专电”,有时一天近 10 条,其中南京专电最多。这些本报专电的电头有不少用的是四号字,或者电头、电文均用四号字。电头用五号字的,则在旁边加印小圆点,以引人注目。其次,还经常采用国内外各地广播电台的消息。如伦敦、旧金山、莫斯科、新加坡、德里电台,以及天津、上海、昆明、太原、青岛等地电台广播的新闻。采用外国电台消息较多的,是关于我国内战的情况。有时也将收录解放区电台的消息,改用国外某电台的电头刊出。这年 2 月 19 日起,开辟“汴市烟云”小栏目,每日发多条一两句话的简明新闻,反映省会各方面的情况,也揭露一些问题。

热情支持学生运动 从 1946 年 12 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统区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反对蒋介石政权的第二条战线。联合版以大量篇幅作了连续的充分的报道,历时数月之久。

1946 年 12 月 24 日晚,发生了美国军士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国民党当局始而封锁消息,继而掩盖真相。联合版抓住这一事件,较开封其他各报早一天于 1946 年 12 月 29 日作了报道,消息上还加了眉题“胜利国之耻”。以后的连续报道,数量也较其他报为多。1947 年 1 月 4 日,刊登了育怀的长篇通讯《愤怒的北大!》,副题是“在中国,女大学生被美军拖去强奸,奴性的才不反抗”,文中摘有学生感人肺腑的抗议书和要求等。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从平、津很快发展到其他城市。开封的学生定于 1 月 4 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河南省政府要求各报对此“勿过分渲染”,但联合版不予理睬,于 5 日仍作了突出报道,并发表社论《民族自尊心的昂扬》,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在游行的头一天晚上,李定中拿来河大学生游行用的《告同胞书》等三种宣传材料,通过刘世明交联

合版连夜免费赶印了数千份。事后,当局曾来追查此事,被报社总经理郭也生搪塞过去了。1月6日,刊登“本报驻京特派员”金沙江的通讯《谁能忍受这污辱?》,在列举平、津、沪、杭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活动后,特意指出南京学生的反应落后了,南京各报对此事的声音是微弱的。这实际是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对南京学运和报纸的压制。1月8日又发表“本报驻天津特派员”吴铭的通讯《天津学生的愤怒!》。

对于公审美军强奸案的动态、开封学校教师的抗议及各校对北大的声援等,联合版都作了充分报道。1月20日刊出“本报北平专电”,报道北平对公审此案限制记者听审深表不满的消息,并发表社论《正视沈崇案的审判》。1月24日发短评《沈崇案的审结》,指出:审判的法庭是由美军组成,这是对中国法权的严重侵害,并强调“对皮尔逊的审判,也就是对美国在华驻军政策的审判,因为倘无此政策,皮尔逊是不会来华犯罪的;同时,这又是对中国某些媚外求荣者的审判,因为他们曾不断企图以谎言来掩盖事实”。3月4日报道美军暴行案判决,皮尔逊被罚劳役15年,并开除其军籍,但这一判决还须由华府最后核定。6月20日联合版据加里福尼亚合众电,透露美海军法务长官复审皮尔逊案,认为强奸案难于成立,皮尔逊准予释放复职。此事令人十分气愤。8月12日中央社讯称:美海军部长认为此案罪证不确凿,撤销对皮尔逊的判决。13日联合版在第一版发此消息时加了框,标题是一个大的“!”号,放在文中间,以引起读者的警醒。14日发中央社讯称,外交部对此案数度向美方交涉,促其照原判执行,联合版将此消息仍放在第一版加框发表,标题是一个大的“?”号,放在文中间,对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态度表示惊讶。

1947年5月起,全国各地以大学师生为主开展了声势浩大的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联合版及时连续报道，并发表社论予以支持。

5月初，河南大学教授开始罢教。5月5日，联合版发表本报记者李松灵采写的消息《希望生活下去——河大教授罢课了！》，指出大学教授工资本来较高，已难以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员工及学生就更难以维持了。红薯1200元一斤，稀饭200元一碗，靠每月1万元公费度日的学生怎能生活呢？6日发表社论《从大学教授停教谈起》，内称：“大学教授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教育算什么教育？我们的国家算什么国家？”随后，河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决定以罢课支持教授罢教，并组织赴南京请愿团。5月22日，河南大学出动千余学生，把欢送卢治国等13位代表晋京变成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张贴标语，反对内战，要求改善公教人员待遇，提高学生副食费，并向群众宣传晋京请愿的意义等。23日，联合版以头条消息对此报道。“汴市烟云”中还配发了两条小消息：学生在车皮上涂满各色标语，使“绿钢皮”变成了“花钢皮”；游行队伍中有两人高举骷髅，有的敲着空碗游行，沿途群众无不怵目惊心。

对各地学生运动情况，联合版也作了及时报道。5月22日发表社论《正视学潮》，指出：“国家残破到大学生、大学教授没有饭吃的严重程度，而战乱仍不能息，清明仍不能有，这个问题又如何严重可怕！这种局面实在不能任其拖延下去了。”

5月28日，开封治安当局为镇压河南大学学生运动，突然出动大批武装宪警及便衣包围学校，逮捕学生40余人。联合版于5月30日发表社论《河大不幸事件应从宽处理》，比较婉转地替学生说话。社论说：“学潮的发生，不拘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直接产生于社会不安。”“盖青年人为国家之瑰宝，青年对政府的措施，纵有

不满，但政府对于青年，只能视为子弟，决不能存丝毫敌意，这一点在处理学潮上是必须注意的。”“希望学校当局早日负起庄严之责任，一方面安定在校同学的情绪，一方面迅速保释被拘的同学，以谋事件的迅速解决。”这一社论受到学生的好评。

北平学生曾将6月2日定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学生在这一天同时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为了制止这次大游行，决定抢先于6月1日在全国各地实行大逮捕。这天开封全城戒严，交通断绝，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搜捕十数小时，逮捕学生、教师、记者、公务人员等40余人。开封新闻界七人被捕，其中有联合版的赵悔深、梁风（梁建堂）、孙良田、李勤士（李松灵）四人，均以“煽动学潮”的罪名被捕。与联合版有密切关系的刘世明，已到《民权新闻》工作，这次也被捕了。另两人为《工商日报》记者李军泗、《力行日报》总编辑王曼洛。

河南省政府警务处长杨蔚，事先曾向郭仲隗透露6月1日将实行大逮捕的消息，并告知其中有联合版的人。郭海长5月31日得知此消息后，即与刘国明、赵悔深等商量对策。他们分析：这次大逮捕是全国性行动，目的是为了预防“六·二”学潮，而且究竟逮捕谁也弄不清楚，如盲目躲避，反而引起怀疑，背上“畏罪潜逃”的罪名，对报社也不利，加上时间紧迫，也未必能走脱，因而不如坐等。同时，决定采取攻势，先发表要求严惩贪污的社论，报社人员被捕后，就作为官方为此打击报复，以便抗争。当晚，由赵悔深赶写社论《整肃贪污》，要求迅速判处省府秘书长、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田梦嘉贪污案，并说田梦嘉威胁本报，态度强横，“刻风闻正谋予本报以不利”，“但大义在前，本报亦不敢因此有所避惧而放弃言责”。社论写完发排时，天色已亮，军警来了，赵悔深等四人分别在报社和家中被捕。开封各报除《河南民国日报》外，对此次逮捕都发有消

息。6月2日，联合版就此事发表社论《安定人心》，指出：“社会需要安定，人心需要安定……这样骚乱恐怖的局面倘再延长，整个祖国就要被断送进去了。对于昨天被捕的人，我们希望当局：第一，要站在维护人权的立场，给他们应有的款待，并尽速转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第二，各团体、各机关主管人能负责保释的，应立即准予保释；第三，应准其接见家属及致送衣物。此外，我们希望当局深切了解，镇压逮捕，虽为不得已的手段，但在政治上实在是再愚笨不过的办法。”由于舆论的压力及记者公会联名具保，这七名新闻工作者于6月10日全部获释。开封记者公会于次日在各报刊登鸣谢启事称：“本会会员王曼洛、梁风、赵悔深、孙良田、刘世明、李勤士、李军泗等七人，被人诬陷，于六月一日经警务处逮捕，嗣经政府查明确无扰乱治安事实，予以释放，承各界人士主张公道，关怀备至……特此鸣谢。”

联合版以极大热情报道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对于指责学生运动的文章则不予刊登。当时，报社董事徐旭生曾要求登载他写的批评学运的文章，也被婉言谢绝。徐旭生为此非常恼火，声言要辞去董事职务。后经过说服及事实的教育，徐也认可了报社的做法。

报道马歇尔“调处”失败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与中共进行和谈以争取时间，一面积极部署内战，不断进攻解放区。美国则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以“调处”为名，支持蒋介石的备战行动。1945年12月1日，马歇尔受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命来华，开始“调处”活动，经过一年多的“调处”，蒋介石已全面发动内战，马歇尔的“调处”任务也就宣告结束，奉命回国。联合报于1947年1月9日为此事发了消息，刊登了“马歇尔声明”的全文，并发表社论《送马歇尔回国》。社论指出：“马歇尔的来华，带来了千万中国人的希望，但马歇尔离华，也带去了千万中国人民的幻想。从对和平的幻想变

为对和平的争取，这是马歇尔到中国一年来留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从这一点意义上说，马歇尔仍然是值得纪念的。”1月10日又发社论《马歇尔声明读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马歇尔声明中缺少颇为主要的部分，便是留华美军和美国政策与一年来中国局势的关联。”1月31日社论《论美国退出调解》，再次指出：苦难的中国，“和美国插手进来时比较，没有丝毫改进，恰好相反，目前的局面比从前更糜烂、更暗淡、更危机”，“作为中国的主人的我们人民，不能依赖国际，不能等待历史，不能蹉跎时间……我们必须一致奋起，以各种力量把僵局打开，自谋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命运，握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手里，我们应该自觉，决不要为美国的撒手而灰心丧气！”这些言论含蓄地描画了美国扮演的角色，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报道经济紧急措施，敦促当局打“真老虎” 1947年春节以后，上海黄金、美钞大波动，黄金价格直升，两周内几乎上涨一倍，金融市场空前混乱，进而促使物价普遍上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采取紧急措施。联合版就此事发表了许多本报南京、上海专电，并要求当局打“真老虎”。

联合版于2月11日发表社论《金钞暴涨与经济危机》，指出黄金美钞的猛涨将带来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与秩序的崩溃，这是一个不堪设想的大危机！2月15日在头条位置以“本报南京专电”，报道立法院、国民参政会群情激愤，立法院要求宋子文院长辞职以谢国人，以及傅斯年大声疾呼清查孔、宋财产等重要消息，还报道了美国公布中国私人在美国的存款巨额（3.564亿美元）。17日，在报道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时，发表社论《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公布》，指出：假若预算赤字不能弥补，国内生产大破坏不能早日停止，那么取缔黄金买卖，禁止外币流通，就只能逼令游

资向其他日用必需品发展,其后患就不堪设想了。18日又以“本报南京专电”发表某经济学家对经济紧急措施的评论,指出:“今日中国经济病态之根源,皆由于内战之进行,设不停止内战,则任何措施均不能见效。”“至于禁止黄金买卖,不过徒使黄金转入黑市;外币之禁止流通,则将使外币自黑市转入黑黑市耳。”

这期间,联合版不断以本报专电报道有关黄金、美钞风潮的方方面面,如“政府拟公布国外存款户头名单”、“金钞风潮与军人在沪大量抢购黄金有关”、“上海某闻人(在操纵黄金名单之内)避居香港”、“上海自费留学生大闹中央银行,要求以发榜时价格购买外汇,该行总裁贝祖诒避走”、“操纵金潮犯黑名单将公布”、“上海查获金潮操纵犯百余人,将交付军法审讯”、“国民参政会请处分宋子文及有关部长”等等。有时一天发本报专电10条以上,报纸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2月26日,联合版又发表社论《拍苍蝇与打老虎》,指出:“操纵金融的巨犯,既拥有这么大的游资,则毫无疑问又是发‘抗战财’、‘胜利财’、‘复员财’、‘接收财’的过来人。”“希望这次中枢能打死几个真正的‘老虎’,使社会一新耳目。”3月24日,配合“本报南京专电”报道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惩办金潮案主犯,充公贪污财产的消息,发表社论《没收贪污财产》,尖锐指出:“过去全会通过的庄严决议不知有多少,但往往一场慷慨之后即无下文。中国官场最重人事,一涉及人事,什么决议都往往变色。”“这一次我们希望不要再蹈过去的复辙,国基已危,民愤已深,对大大小小的民族蠹虫,再不能容忍包庇宽容下去了。宽容他们就要失去人民。这一次决议的实行程度,将为国民党能否起死回生的一个试金石。”

报道解放军撤出延安 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后,1947年上半年被迫采取重点向山东和延安进攻的办法。

1947年3月,蒋介石令胡宗南率23万多人进攻陕甘宁边区。解放军贯彻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国民党军进占延安。联合版早在2月26日就以“本报南京专电”报道合众社延安电称:延安“最近人口已由五万人减至五千人”,“本地一切工业设备已迁至数十里外。”“如政府军开始进攻延安,将不作‘无目的’之保卫,此说朱德总司令亦不否认。”这就透露了解放军的作战意图。然而到国民党军进占延安之时,刘国明和编辑们对如何报道还是煞费苦心。当时,国民党当局兴高采烈,大肆宣传所取得的“胜利”及其重大意义。开封各报一片喧嚣。联合版不能不采用中央社的电讯,标题则不大相同,其主题是:“国军收复延安”,副题是:“共军经巷战向清涧溃退,中宣部说明收复延安意义”。3月21日《正义报》头条位置发的陈诚辟谣加框新闻,题为“老巢岂甘轻弃!(引题)/延安绝非空城(主题)/陈诚总长力辟外传谣言(副题)”,另发三栏题为“延安收复影响至巨/戡乱时间必可缩短(主题)/陈总长对剿共具有把握(副题)”。而同日联合版刊登的“收复延安中外反响”,内有中联社电讯,称:“……国军进城以后,发现系一空城,因中共机关人员早已撤退,必需物资均已移去。”对中央社电讯报道的陈诚总参谋长为收复延安是一空城之说辟谣的消息,联合版竟未予刊登。对是否要发社论,联合版同仁经反复研究,最后由刘国明执笔写了社论《国军收复延安》,在第一版发表。社论说:“延安是中国赤色首都,是中共经营了十三四年的根据地,自政治的意义判断,中共对之必将聚最大兵力进行最坚强的保卫。所以,一般推测,延安之战,不爆发则已,一经爆发,必将成为最激烈最有决定性之一役,即令中共在军事上着重运动战略,但这一地区的战斗,则将有相当时期的持续。但现在情况如何呢?……前后不过一星期,即收复此一名城。”

“延安的收复，是国军在西北的一大胜利，但鉴于战事发展迅速，与共军之避免主力决战，则对于整个西北局面，似尚难遽抱澄清之望。”社论没有大事宣扬国军的“胜利”，也没有贬抑共军的“失败”，而是巧妙地给读者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中，联合版能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报道顾莹案 《中国时报》1946年3月12日就曾在“读者之页”中，以半版篇幅刊登“读者设书”，揭露河南商城县土皇帝顾莹横征暴敛、杀人盈野的罪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当年10月30日在第三版，刊登了豫鲁监察使署对顾莹案的纠举书，列举顾莹草菅人命、贪污渎职罪行11项。但直到1947年4月，这个轰动全国的案件才在开封地方法院开庭审理。版合版对此作了连续报道，并先后发社论两篇。4月3日的标题是：“人山人海争看土纳粹（引题）/开封地院公审顾莹（主题）/昨讯贪污共42款，关于杀人部分今继续审讯（副题）”。同时发表社论《杀顾莹，振纪纲！》，强烈表达了人民的意愿。4月4日，报道续审顾莹杀人罪时说：“当日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但旁听席上仍无隙地，门口窗外，拥挤一如前日。”3日、4日两天，还发有“审顾花絮”十几条，反映顾莹的罪恶及人民对他的仇恨。如“胡家骧叙及父兄被杀，个人流浪十余年时，泫然欲涕，听众亦不禁为之酸鼻”，“据说顾莹在狱中曾说：‘我死了也值得，我总算已经活埋了四百五十五个人了’”等。开封地方法院判处顾莹死刑时，联合版发社论《顾莹的判决》，及时提醒读者：地方法院判决后，杀人部分还可以上诉；贪污部分，经最高法院复判，顾莹还要利用一切机会，重新脱网。因此，须注意今后的发展。通过以上报道，造成社会舆论，增强了对贪官污吏的震慑。